

444

獨立評論

第一三九號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

吳景超

大學教育與中國前途

顧毓琇

居里夫婦合傳譯本介紹語

陶哲

弱國是否無外交

張忠絨

中東路出售以後

吳其玉

論別字

佩絃

歐游隨筆（九）俄德的異同

蔣廷黻

編輯後記

編者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 大學出版社 | 天津 | 天津書局 代定 南洋書局 | 上海 |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 南京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 蘇州 | 蘇州書店 | 常州 | 常州書店 | 徐州 | 徐州書店 | 漢口 | 漢口書店 |
| 濟南 | 濟南書局 | 青島 | 青島書局 | 煙台 | 煙台書局 | 鄭州 | 鄭州書店 | 開封 | 開封書店 | 西安 | 西安書店 | 長沙 | 長沙書店 | 衡州 | 衡州書店 |
| 廣州 | 廣州書店 | 汕頭 | 汕頭書店 | 廈門 | 廈門書店 | 福州 | 福州書店 | 汕頭 | 汕頭書店 | 梧州 | 梧州書店 | 柳州 | 柳州書店 | 貴陽 | 貴陽書店 |
| 昆明 | 昆明書店 | 重慶 | 重慶書店 | 成都 | 成都書店 | 西康 | 西康書店 | 蘭州 | 蘭州書店 | 銀川 | 銀川書店 | 西安 | 西安書店 | 太原 | 太原書店 |
| 保定 | 保定書店 | 石家莊 | 石家莊書店 | 張家口 | 張家口書店 | 歸綏 | 歸綏書店 | 包頭 | 包頭書店 | 西安 | 西安書店 | 蘭州 | 蘭州書店 | 西寧 | 西寧書店 |
| 蘭州 | 蘭州書店 | 西寧 | 西寧書店 | 迪化 | 迪化書店 | 哈密 | 哈密書店 | 吐魯番 | 吐魯番書店 | 鄯善 | 鄯善書店 | 哈密 | 哈密書店 | 吐魯番 | 吐魯番書店 |
| 鄯善 | 鄯善書店 | 哈密 | 哈密書店 | 吐魯番 | 吐魯番書店 | 鄯善 | 鄯善書店 | 哈密 | 哈密書店 | 吐魯番 | 吐魯番書店 | 鄯善 | 鄯善書店 | 哈密 | 哈密書店 |

地址：北平後門外北門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

吳景超

前年胡適之先生從美國講學歸來，在獨立評論第一次發表的文章，便是「建國問題引論」。(獨立第七七號)他在結尾的時候說：

所以我們提議：大家應該用全副心思才力來想想我們當前的根本問題，就是怎樣建立起一個可以生存于世間的國家的問題。這問題不全是師法外國的問題，因為我們一面參考外國制度的方法，一面也許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幾千年歷史裏得着一點有用的教訓。在建設的過程中，胡先生對於東西文化的保存與採用，採取一種折衷的態度，于此可見。最近看到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他們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與胡先生的一樣。他們說：

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于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

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于現代中國的需要。(文化建設一卷四期)

這種折衷的態度，我個人是很贊同的。不過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除却折衷這一派以外，至少還有兩派，是妨礙在兩個極端的：一派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一派主張復返中國固有文化。在這兩派之中，第二派沒有討論之價值，因為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這一派能提出一種在理論上站得住腳的主張。而且這一派的勢力，在青年中可謂薄弱已極，不久自歸淘汰，我們也不必枉費時間來與他們辯駁。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人，不但有鮮明的主張，而且有理論作他的根據。現在我願意把這一派的理論檢討一下，然後再說折衷派此後應有的工作。

在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人中，又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文化社會學為根據的，另一派是以經濟史觀為根據

的。前派可以陳序經先生爲代表，後派的代表頗多，不必細舉。

在文化社會學中，派別是很多的。美國現在流行的一派，注重于文化的分析。在他們分析文化時，有一個基本的概念，便是文化單位。每一種文化單位，有其特殊的歷史，有傳播性，但最要緊的一點，就是這些單位不能獨立存在，每與別種文化單位，混合而成爲文化集團。（關於文化社會學的理论，可參觀孫本文先生的社會的文化基礎，他是介紹文化社會學于中國最有成績的一人，但他的主張，却與陳序經先生不同。）陳序經先生在美國時，大約受過這派學說的影響，所以數年前他在社會學刊二卷三期中，發表了「東西文化觀」一篇文章，便提倡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他的理論是：

文化本身是分不開的，所以他所表現出的各方面都有連帶及密切的關係。設使因了內部或外來的勢力衝動或變更任何一方面，則他方面也受其影響，他并不像一間屋子，屋頂壞了，可以購買新瓦來補好。……所以我們要格外努力去採納西洋的文化，誠心誠意的全盤接受他，因爲他自己本身是一種系統，而他的趨勢，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

獨立評論 第一三九號 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

因爲「文化本身是分不開不得」，西洋文化是「一種系統」，「各方面都有連帶及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在一方面如採納西洋文化，別方面也非採納西洋文化不可。假如這種理論是對的，那麼全盤接受說便可成立，可是「文化本身是分不開不得」的說法，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我們可以承認火車頭與軌道兩種文化單位是分不開的，男女同學與社交公開兩種文化單位是分不開的。我們決不能一方面採納西洋的火車頭，一方面還保存中國的土路；也不能一方面採納西洋的男女同學，而一方面還保存中國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但是整個文化的各部，是否都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分不開」呢？我們採納了西洋電燈，是否便非採納西洋的跳舞不可呢？採納了西洋的科學，是否便非採納西洋的基督教不可呢？我們的答案，恐怕不會是肯定的。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開，有的是分得開。別國的文化，有的我們很易採納，有的是無從採納。關於這一點，現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麥其維說得最透切。程天放先生，曾受業于麥其維教授之門，我們可以引程先生最近發表的幾句話，來代表麥氏的理論。程先生說：

吾人可將文化分成兩部份，即一部份爲含有世界性

者，一部份爲含有國別性者，例如自然科學，以及交通，工業，醫藥等；即含有世界性之文化。……至於政治制度，教育設施，交際禮儀，生活習慣等，則各國有各國之歷史背景，無法強同，亦不必強同，此即所謂含有國別性之文化。（本年二月十五日天津益世報）

麥氏在其著作中，稱程先生所謂「含有世界性之文化」爲「文明」(Civilization)，而稱程先生所謂「含有國別性之文化」爲「文化」(Culture)。此說與德國社會學者亞富勒魏伯之意，不謀而合。前幾個月我寫了一篇文章，介紹德國的社會學，其中有一段，提到亞富勒魏伯的文化觀

文化與文明的分別，便是文明是「發明」出來的，而文化是「創造」出來的。發明的東西，可以傳授，可以從一個民族傳播到另一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從這一代傳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學及物質的工具等等，都可以目爲文明。文化既然是創造的，所以他是「一個地方一個時代民族性的表現，只有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內，能保存其原有的意義。別個地方的人，如抄襲過去，總會

把原意失去的。凡宗教，哲學，藝術等，都是屬於文化一類的。（清華學報十卷一期）

我們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例，來證明上述二人的理論。譬如美國發明的電燈，便是「文明」的一種，自從電燈發明之後，現已傳播全球，無論那一國的電燈，其形式與作用，都是一致的。但美國所「創造」的教育系統，只有在美國的環境中，可以發生作用，可以維持下去，別國的教育系統，也許有一二點彷彿美國的地方，但整個的看來，沒有一國的教育系統，可以說是與美國的完全一致。由此可見別國的人學美國，有的可學得到，而有的却學不到。全盤西化的理論，在這種觀點之下，大約是不能成立的。還有，在「西方文化」這個名詞之下，包含許多互相衝突，互不兩立的文化集團。獨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資本主義是西化，共產主義也是西化；個人主義是西化，集團主義也是西化；自由貿易是西化，保護政策也是西化。這一類的例子，舉不勝舉。所謂全盤西化，是化入獨裁制度呢，還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資本主義呢，還是化入共產主義？西方文化本身的種種矛盾，是主張全盤西化者的致命傷。

我們現在再討論第二派，便是「基於經濟史觀的全盤西

化論。

經濟史觀的要點，以爲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勢力，可以左右一切的，便是生產力。在某種生產力之下，便發生某種生產關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和，即是社會的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政治，法律，思想等等的性質。照這種理論推衍下去，我們如不欲採納西方的「生產力」（或生產技術，生產方法）則已，如果採納西方的生產力，那麼其餘的一切，也將不可避免的西方化，因爲上層建築，是受下層基礎的支配，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在生產方法方面，既已西方化，那麼其餘的東西，即使我們不要他西方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在批評這種見解之先，有一點要聲明的，就是諸讀者不要把經濟史觀與社會主義混爲一談。經濟史觀所討論的對象，在社會科學的範圍之內；而社會主義所企圖的，却在社會哲學的範圍之內。社會主義自有他的哲理根據，所以即使經濟史觀不能成立，社會主義的能成立與否，并不因此而受影響。

關於經濟史觀，第一點我們要批評的，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繫，如經濟史觀者所想像的。美國與俄國，所採用的生產力，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但

生產關係却大有分別。又如馬氏所說的從奴隸經濟轉變到封建經濟，也只是生產關係的改變，而不是生產力的改變。所以生產力不變時，生產關係也會變動，生產關係并不完全受生產力的支配。此外還有生產力雖變而生產關係不變的事實。如一八四八年馬恩二氏的宣言中所提到的資本主義，在第一期中是手工生產，而第二期中却是機器生產。生產力變了，而勞資的契約關係，或剝削關係，却始終未變。所以經濟基礎中的兩種原素，并無必然的聯繫，已有事實可以證明。

第二點我們要說的，就是「經濟基礎」，與其餘的「上層建築」，也無不可分離的關係。空喊經濟基礎決定一切，是無用的，假如（一）同樣的生產方式，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內，與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二）假如文化中別的部分，有變動的情形，而在變動之先，找不到生產方式，有什麼變動；（三）假如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之下，我們找到相同的制度及思想。這三個「假如」，并不是臆測，每一個都可找到許多事實來證明他。所以「經濟基礎」決定一切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們即使採納了西方的生產方式，而別的部分，并非採納西方的文化不可。換句話說，經濟史觀，并不能作全盤西化的護符。

我們既已否定全盤西化說，同時又以爲開起門來，談復興中國文化，也是做不到的事，那麼餘下來的唯一途徑，便是折衷的態度了。折衷派的人，遇到目前這樣嚴重的建設問題，對於東西文化，並不是表示一個態度便夠的，也不是說幾句取人之長，捨己之短等老生常談便算完事。

我們第一要「具體」的指出，在中國固有的文化中，那一部分還有適應環境的活力，因此應當保存。我很注意上面這句話裏面的「具體」二字，因爲抽象的談保存中國固有的優美文化，是無濟于事的，即爲近人所提倡的，恢復固有的禮義廉恥等道德之說，我們都覺其近于抽象。假如中國的禮是要保存的，那麼古代的聖人已經說過，「男女授受不親，禮也」，這種禮我們是否也要保存？我們只舉這一個例，便可表示抽象的談保存中國固有的優美文化，對於建設，絲毫無補，反而可以使一般人的思想混亂，無所適從。我們應該繼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從新估定舊文化各部分的價值，要具體的研究與討論，不要抽象的空談，這是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們要做的，便是指出在西洋文化中，那

部分應當採納，能夠採納。所謂「應當」，是指價值而言；所謂「能夠」，是指我們的能力而言。我們的責任，便是經過研究之後，指出西洋文化中，那些部分，對於我們建設新中國時，有用，有貢獻，適合於我們歷史的背景，地理的環境，人民的能力，採納過來，便可發生美滿的結果。

第三，我們在建設的過程中，不但要保存中國的優美文化，及採納西洋的優美文化，有時還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來適應新的環境，或滿足新的要求。自然我們要知道創造，並不是憑空弄出一點簇新的花樣來，只是從舊的文化中，不管他是東方的，還是西化的，選擇出一些可用的文化單位出來，給他一個新的安排而已。但以這個新的安排，新的花樣，來解決新的問題，會比應用任何舊的文化爲更有效力。所以我們一方面談保存，談採納，另一方面還要注意創造。

以上這三種工作，我認爲是折衷派今日的急務，希望國內有志之士，對於這三點能有不斷的貢獻。

二月，十七日。

大學教育與中國前途

顧毓琇

在本刊第一三四號裏，我曾討論過「學術與救國」的問題。我的意思是：學術不一定要負救國的責任；如若學者願意利用學術來救國，那是他們的好意，而是國家和社會所極願接受的。

大學是研究學術的最高機關。學術與救國的關係既然如前所述，那麼我們亦可以說：

大學不一定要負救國的責任；如若大學願意擔任救國的工作，那是大學的好意，而是今日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所最希望的。

在挽救國難復興民族的情緒裏，社會和國家對於我們現有的大學抱有極大的希望，這是誰都承認的。但是，公平的說，大學雖然可以接受大家的督策，來擔負救國的一部分工作，但亦儘可以從超然的學術的立場，正正經經地拒絕這種社會的要求的。

以上是從大學本身的觀點而論。他要研究學術的自由，所以他，既不願接受外界的激刺，亦不願擔負任何學術以外的責任。

但是，有些負大學教育責任的人，或者願意以非希脫自居，而以大學教育為復興民族的中心的。再往上推，教育的當局以至政府的最高當局，或者亦希望國內的大學不祇在學術上做工作，而且對於國家的問題要有確切的研究和解決。那麼，中國國難期間大學教育的使命便不是單層的，而是雙層的了。

現在的大學是否願意擔負起這雙層的責任呢？這自然是先決問題。

如若一個大學願意擔負起這雙層的責任，我們願作下列的建議：

- (一) 大學校長對於國家目前的問題，應有確切的通盤的認識。校長應把這些問題分配於各專科的教授，負責研究和解決。
- (二) 大學應接受政府所委托研究之問題。大學校長應時常與政府當局會商，以明瞭各問題的實在性。
- (三) 各大學教授應就其專門學識切實研究有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凡政府當局或學校當局所委托之問

題，尤應負責研究及解決。研究結果應按期報告校長。

(四)校長應將各教授研究實際問題的結果，按期彙報政府當局或公之社會。

有人要問：以上的建議，如若一個大學的校長和教授都願意這樣做，其中便沒有困難麼？

我的答覆是：有困難——困難在於政府是否合作？其實大學為政府做義務的研究工作，政府難道反而不合作麼？不過，無論如何，在我們的中國，這自然是一個問題——而這亦是我們討論本題的一個先決問題。

假如開明的政府不再徒然歎息教育經費的可惜，而猛然想到要別開生面，利用我國這些公私立的大學，那麼我們願對教育當局作下列的建議：

- (一)教育最高當局對於國家目前的問題，應有確切的通盤的認識。教育當局應從這些問題中加以選擇，分配於各大學，負責研究和解決。
- (二)教育當局應負責介紹政府各部主管人員與研究各專題之教授會談，並由政府各部供給參攷資料。
- (三)教育當局應責成各大學校長按期報告各大學各教授對於各問題之研究結果，並負責將各項結果貢獻

於政府最高當局。

從大學的立場說，每個大學最好自己決定他的使命，他的計畫。從教授的立場說，每個教授最好亦自己決定他自己的工作。就從教育當局的立場說，每個教育部長，自然亦各有他自己的大政方針。

但是，我們從國家的立場看，或者從一個老百姓的立場看，我們願意中國得救，我們願意民族復興。我們要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我們更希望救國中心的學術研究。我們願意政府的最高當局督促教育當局，切實擔負起「教育救國」的責任來，我們亦願意教育當局督促各大學，切實擔負起「學術救國」的責任來。

最後我們希望：

- (一)由政府召集高等教育會議，確定國難期間大學教育的兩層使命。
 - (二)由政府誠意地將國家目前之各項重要問題交各大學負責研究。
 - (三)由各大學各教授分工合作地認定國家目前之各項重要問題，加以研究和解決。
- 假使以上的希望可以達到，我們便可有下列的結果：
- (一)國家的問題有全國的許多專家義務研究，而政府

不必另籌經費，羅致專家。

(二)全國的學者都能確切了解國家的問題，且首負責獻其意見。這些確知國情的教授們教出來的學生，自然對於國家更有用處。

(三)全國的大學生，既感於大學教授對於國事的努力

，又得以間接了解國家的實際問題，則因憂鬱煩悶而消極頹廢或思想過激的，必可以大大地減少，而對於以後國家的安定，亦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二十四年，二月六日

居里夫婦合傳譯本介紹語

衡 哲

這本居里夫人寫的居里先生傳和她自己的自述，是我在兩年前讀過的。那時居里夫人還不會死，故我讀完這本佳作後的第一個感想，是希望將來有機會去瞻拜瞻拜這位女界偉人；第二個感想，便是想把這本精美的小書譯成中文。隔了一年，居里夫人死了，我的第一個希望便從此成爲夢幻泡影。而因爲人事的牽掣，及文債的堆積，第二個希望也就至今未能實現。不久以前，忽然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這本合傳已被一位青年科學家譯成中文了。他問我不能不爲他寫幾句介紹語。我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便立刻答應了；雖然這位譯者我至今還不會會過面。

我所以希望這本小傳能譯爲中文的理由，擇要的說來，至少有下列的三個。其一，是他對於居里夫婦的偉大人

格的反映；其二，是他所暗示的教育的真正意義；其三，是他所暗示的女子機會平等與文化前途的關係。至于關於居里夫婦對於科學及人類的另一個大貢獻——鈾質的發明——則另有許多專家專書的詳細記載與研究；此書于此雖也有許多有價值的報告，但當然不能十分詳盡，并且也不是一個非科學家像我者所特別注意之點，故且擱開不論。

說到傳記文學，我常有一個愚見，以爲我國的傳記固然失之太簡單，太抽象；但西方的傳記文章有時也不免太冗長，太蕪雜。這本小小的夫婦合傳恰正合了我的口味：牠寫得是那樣的具體，却又有嚴厲的選擇。雖然全書只有寥寥六萬餘字，却是把這夫婦兩人的天才與人格，學問與見解，很忠實，很藝術的顯示在我們的眼前了。依我看來

，這才是傳記文學的上乘。但是，沒有那內畜的精華，外表的光采也是不能有的。這本小小的合傳，若不是靠了牠那一雙主人翁的偉大美麗的人格，牠又那能這樣光彩四射，像一顆完美的明珠呢？

我對於制度化的教育——尤其是以制度為中心的教育——向來便甚懷疑；以為牠雖是一種普及教育的不得已的辦法，但牠對於天才的影響，恐怕還是在負的方面為多。這一個小小的群兒，不意就在這本合傳中得到了兩個有力的證明。其一，是居里夫人在居里先生傳中說的，他在幼小的時候，他的父母怎樣的了解他不是一個能吸收指定式的教育的人，而不強迫他去受正式教育的一段記載。其二，是居里夫人在自述中所說的，關於他夫婦兩人教育他們的兩個女兒的意見；以及居里夫人怎樣的聯合了朋友們，自己去辦一個適宜于發展天才的學校，并且她還親自去授課的一段記載。假使我們承認居里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天才，假使我們也承認他們的女兒也是兩位成功的科學家；那麼，我們對於制度化教育的懷疑，不也值得現在國內教育大家的虛心的注意與研究嗎？

雖然從生物學的立場看來，男女是天生不平等的；但生物學能包括一個人的整個生命嗎？一個男的或是女的，

除了做一個性動物之外，難道便沒有一個更高更大更偉美的使命在人間？在男女之間，除了那個不平等的性人格之外，難道沒有一個更為重要更能超出動物區域的一個平等的個性？爲了這個男女平等的個性，我們便不得不要求一個女子發展個性的平等機會，一個在教育上，環境上，以及職業上的平等機會。

居里夫人在科學上的貢獻。却正給了我們這個要求一個最好的理由。假使居里夫人因為生為女性的緣故，得不到一個研究科學的機會，假使那時被蘭，或是法蘭西的政府，已經走到現在德意志或意大利所走到的地方，而對她說，『回到你的廚房去，回到你的育兒室去，那是你的唯一的世界！』請問，在這樣情形之下，這位女科學家那還有成功的機會？我們又那能得到這個文化上的大成績？不如此，居里夫人的天才雖然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但她却也不會因此放棄了她的兒女與家務。她的和美的家庭，她與居里先生合作的成功，以及她的兩個女兒教育的優良成績，都是足以證明一個女子的生命是可以得到多方面的發展的，她的女性和個性不但可以不相衝突，并且還可以互相受惠的。但是，假使缺少了那個機會平等的重要條件，這個美滿的情形還能產生嗎？

故我們相信，居里夫婦的偉大，是遠超于他們在科學上的貢獻的；雖然靠了這個貢獻的本身，他們兩人已足夠不朽。他們在人格方面，給了我們一個美麗的模範；在生活方面，指示了我們一個夫婦結合的最高意義；在教育方面，證明了制度化教育的不適宜于天才；在婦女問題方面，更是有力的駁倒了女子只有性人格的一個愚妄與男子自私的觀念。

為這種種原因，我十分高興能為這本合傳的譯者，黃人傑先生，寫這一篇介紹語。我希望靠了譯者的忠實的譯

弱國是否無外交？

張忠絨

『弱國無外交』，這句話在現時已成爲一般國人對於中國外交的結論。然而我以為這句話是錯誤的。強國固然需要外交，弱國尤其需要外交。一個弱國被強國壓迫，受強國的宰割，而欲專靠他本國的力量，企圖打倒敵人——這在科學昌明的今日，幾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可以用歷史上的事實來證明，弱國不是沒有外交的。

維也納會議的意大利，北部兩省被維也納會議劃給奧國，中部南部也在奧國的勢力範圍之下。但是薩地尼亞

筆，這本精美的，合文藝與人生爲一的，居里夫婦合傳，能在中國讀者們的心田上，下一粒美麗的人格種子，一粒真而善的人生觀的種子；使牠將來能發芽抽條，爲我們這個衰萎的民族，開出一簇美麗的花朵來！

按居里夫婦合傳原名爲 *Marie Curie* 附居里夫人自述。法文原作者，居里夫人。英文譯者，美國科學家克洛格君及夫人 (Vernon and Charlotte Kellogg)。一九三二年在紐約的 Macmillan 公司出版。

(Sardinia) 的政治家加富耳 (Cavour) 認定，欲復興意大利，必須打倒奧國，於是運用外交，先設法獲得英法兩國的同情，然後於一八五九年與法皇拿破崙第三締結同盟，共同對奧宣戰。一八五九年的戰爭，雖因拿破崙第三單獨退出，加富耳的目的沒有達到，但是薩地尼亞已因是直接自奧國獲得郎巴狄 (Lombardy) 一省，而間接獲得塔斯加泥 (Tuscany) 馬迭那 (Modena)，巴瑪 (Parma)，羅馬加那 (Romagna) 等地，奠定了統一意大利的基礎。

八六〇年加富耳復乘統敘利 (Saly) 國內發生內亂的機會，利用英法兩國的同情，出兵佔據了耐波耳 (Naples) 王國及恩布利亞 (Umbria)，馬撒斯 (The Marches) 兩地，改薩地尼亞為意大利。其後因普奧戰爭而併有威尼沙 (Venetia) 因普法戰爭而進佔羅馬，卒完成意大利的統一。

普法戰爭後的法國，將阿爾薩斯，洛倫 (Alsace-Lorraine) 兩省割與德國，并賠款五千兆佛郎。然而法國的政治家認定，欲復興法國，必須打倒德國。於是運用外交，於一八九一年與俄國締結同盟，一九〇四年與英國締結協定，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二年與意大利成立種種諒解，因是而德奧陷於孤立，畢士馬克孤立法國之政策，反成為「作法自斃」。大戰以後，法國仍得恢復其歐洲盟主的位置。

上面所舉的歷史上的兩件事實，已足以證明「弱國無外交」這句話是錯誤的。意大利直至奧國勢力完全被驅出於意大利境外的時候，意大利始終不是奧國的對手。法國直至歐戰開始的時候，法國始終無力單獨與德國抗衡。意法兩國的成功，不是意大利的實力戰勝了奧國，或者法國的實力戰勝了德國，而是他們的外交戰勝了他們的敵人。

這是歷史上的事實，我們怎麼可以說弱國沒有外交？

再看歐戰前的塞爾維亞：塞爾維亞以撒爾小邦，於一九〇八年奧國強併波赫兩省後，認定奧國是他的敵人，於是運用外交，與俄國深相結納。及塞拉甲窪 (Sarajevo) 事件發生，終賴俄國援助，而引起世界大戰，塞爾維亞得於戰後擴大而成南斯拉夫國。這又是弱國利用外交成功的例證。

上面的敘述，只在證明「弱國無外交」的這句話是錯誤的。愈是弱國，外交愈是重要。強國——尤其是地勢優越的強國，他的外交稍有疏忽，尚不致對於他的前途發生重大的影響。弱國的外交稍有不慎，即可招致亡國滅種的慘禍。我並不是說弱國應當專靠外力以求生存，外交與內政本是相輔而行的，內政不修實力不充的國家，在外交上勢必要遇到種種困難。外交與作買賣的性質相似，沒有實力的國家，與人爭論，因為沒有武力的後盾，固難獲得勝利，即與人妥協，除完全屈服外，亦難獲得美滿的結果，甚至與人締結同盟，亦不能拿出交換的條件。但是專注意內政，不注意外交，此種辦法也不是盡善盡美的，對於弱國，尤其是如此。因為弱國在既弱之後，要想專靠修明內政，趕上強國，在現時的國際狀況下，幾幾乎是不可能的。

，何況他的敵方強國尚未肯予他以修明內政，充實實力的機會！

歷史上的事實，在在均足以證明，被強敵壓迫的弱國的唯一出路，只有運用外交，以求得修明內政充實實力的

中東路出售以後

吳其玉

據最近報紙的記載，中東路出售問題，已經於一月二十二日在東京，由俄方代表加賈洛夫斯基氏，及日本代表東鄉氏成立妥協六條了。這種協定雖然現在還在起草中，還沒有簽字，不過他的成立，和中東路的出售，大概是不成問題的了。絕不會如俄方二十二日所說的，會有什麼「困難發生」的。這件事，在日俄方面講，是他們兩年來最大的，并且是危險的問題。所以他的解決，對於日俄的關係自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并且祇會有好的影響。但是對於我們，則無疑的是一種權利的侵犯——侵犯了中東路合同第十二款自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為限……八十年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合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假；又自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償贖回，及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五項，兩締約國政府承認對

的機會，同時善用此種機會，以增加本國的實力，充實外交的後盾。外交與內政運用得法，相輔而進，然後才可以打通一條出路，爭得已國生存的權利。智諸讀者，以為如何？

於中東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的規定。所以我們的政府聽了這消息，就表示如果此項非法買賣成立，我方將發表嚴正之聲明，保持主權，宣示態度，這樣的宣佈，在法律的手續方面講，自然是應該的，但是他不會發生任何實際的影響，却也是非常明顯的。我以為單是聲聲明來補救這個情勢，是絕不行的，必須靠其他的方法。并且我的意思，我們所要設法的，也并不是阻止中東路的出售，因為無論如何他是要出賣的，而我們所要補救却是中東路出售以後的情勢。換句話講，就是：我們所要補救的是將來，前幾天報紙曾登載顧大使要回任去，這事我不知道與中俄外交的前途有否關係，更不知他的回任會否受中東路出售的影響。但我却很願意借這個機會，把個人關於中俄外交的愚見說出來。

說起中東路的出賣，一般的理由自然是：（一）俄國方面暫時的採取和平的外交政策，不欲多事以阻止他國內政治基礎的奠定，和經濟計劃的進行；（二）日本在東四省現在正積極造路，不久他的路網計劃就可以成功，若使蘇聯保守中東路，不特日本要常常和他們搗亂，并且不久恐怕該路就要成爲無用了，所以倒不如賣出去，換一筆款和一批貨，來發展他的經濟計劃。而在日本方面的理由，自然是想把俄國推出東北去，好讓他來侵略或獨佔東北一切政治，及經濟的利益。但是我們還要注意的是這次售路交涉的成功，似乎還受了最近國際政治的影響，就是海軍縮軍談判，及今年海軍會議的影響。在表面上講，中東路的交涉似乎是日僞方面外交的勝利，而俄國方面完全是退讓。不過我們若使稍稍注意這事的交涉，就可以知道雖然自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售路交涉開始後。日僞方面的態度非常強硬，并且會於一九三三年九月用武力逮捕該路蘇籍職員多人，結果使雙方的關係非常緊張，但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日方的態度確是和緩的多，如路價之增加，及最近之允許担保路價之價付，都可以表示日本方面也是有相當讓步的，是有誠意與俄方妥協的，所以這中東路之交涉，纔能急轉直下。這種退讓的緣故，在日本方面，我以為

多少是受海軍會議，或日本對英美的外交所影響。就是：日本眼前的外交問題，似乎是海軍問題，所以必須用全力來應付海軍會議，或英美方面外交的陣線。而對於俄國必須暫時和緩一下，以免兼顧不暇。所以不惜遷就俄國的意思，把日俄間最易惹起糾紛的中東路問題先行解決了。

若使以上的揣度，離事實不遠的話。那麼日俄關係的發展似乎還有更進一步，而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或成立一種諒解的可能。這事初聽起來似很無理，但并不是絕無可能的。第一自東北事變後，俄國已經向日本提出締結不侵犯條約。這其中表面的理由，自然是近年來締結不侵犯條約，或睦鄰主義已經變成蘇聯外交最大的原則了。而實際的原因，還是因爲蘇俄在眼前是絕對不能與別國開戰的。我們若使稍稍注意蘇聯最近國內之政治情形，經濟及軍事狀況，就可以明瞭這一點。簡單的講，蘇聯的內部還是不安定，而他的軍事及經濟的預備還未充實，所以單就俄國講，成立此種諒解可以說是毫不成問題。第二就日本方面講，最近日本之感到外交孤立，是無可諱言的。若使英美，特別是美國對於軍縮的態度不變更，那麼我以為無論日本退讓與否，皆在在東亞找到一個朋友的需要，而這位朋友在眼前講似乎還是蘇聯最有資格。所以就日本方面講日俄的

諒解也是可能的。自然照理講，日本一日不退出亞洲大陸，日俄對峙的局面是絕不會被取消的，從而日俄衝突的可能性也永遠存在着。但是國際情形的變遷，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日俄關係，最惡劣的時間，自然是日俄戰後了。但是不久因為英美提倡門戶開放主義，和滿洲鐵路中立等等計劃，而日俄便又聯合起來對付英美了，眼前的情勢自然和日俄戰後，至歐戰期間的東北的情勢絕不一樣。因為俄國在東北已經毫無勢力了，用不着和日本勾結起來，去抵抗第三國。但若使日本誠意對俄頓化，日俄間相當的諒解，並不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日俄的諒解對於中國不會有利，祇會有害，自然也是明瞭的。所以這一層似乎頗值得我們的注意。

此外，最近日本對華的政策，似乎也受了海縮的影響，本來自去年通車，通郵各問題解決後，中日間的關係已經漸漸好轉了。但是新年以來，我們所得的消息，却是與這個趨勢相背馳的。例如最近外務省宣佈要取啄木鳥外交，大連會議，及近數日來之察東事件，及廣田對華外交政策之演說裏，所提倡的日華政治協定都足表示日本對華的外交又要積極了。這其中的作用，我們雖不敢推測，但他的目的是要於海會前，把中日的問題解決，把日本所造成

的局面得到法律的承認，以造成一個事實的局面，來對付海會使海會無法，或至少難於討論政治問題，却是很可能的。所以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的注意。

根據以上的推測，那麼我們的結論便是：在一九三五年的海軍會議前，日俄的外交與中日的外交，都有變更的可能，而這種變動若果實現，對於我們都是有害的。自然在今日的情形下，這一種的變動，我國絕沒有能力來制止，但是無論如何我以為在最近的將來，下列一事，我們必須努力，促其實現。就是：與蘇俄成立相當的諒解，或增進友好關係，千萬不可因他出賣中東路，而即行仇視。我這句話並不是說我們要與俄國同盟，或藉他的力量，來抵抗日本，或叫他不與日本和好，或不與他成立不侵犯條約等。我的意思是：若使我們可以和俄國成立一種更深的友誼，無論如何對於我們是有益的。近來國內有一種論調，以為中國不應靠外交做奧援，祇可以自己振作，若靠外交便是自殺，所以一切的外交都不過問。這種言論，我覺得幼稚得可笑，其實以往日本對於我們的侵略，自甲午之戰，經二十一條約迄九一八事件，那一件不是等我們外交孤立無援的時候，和他國無暇顧遠東的時候來下手呢？所以外交的奧援，縱然不能幫助我們，也絕不會對我們吃虧的。

而對外交好的關係，更是在必求之列。因此我以為眼前對俄的友好，是絕不至有害於我們的。而這事的成功，和可能性自然是要看我外交的運用，和國際的情形而定。這是實際的問題，而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最後我還希望我們在最近將來，對於一般的外交關係，可以有相當的改良，和進步。我們近六七年來的外交，可以說是喊口號的外交，而喊得最響的便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口號是蘇俄傳授的，然而結果我們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不過徒然的得罪

論別字

前年作過一篇文章，說到高中畢業生寫的別字之多。這一年多又看了多少高中畢業生大學一年生的國文卷子及作文本子，還是覺得如此。前年十月十一月申報自由談裏「論語」裏有過一回別字的討論，有人說青年人寫別字讀別字應當寬恕，有人却主張提倡——因為漢字實在太難，這麼着可以給簡筆字之類開一條門路。去年「太白」創刊號裏也有胡愈之先生「怎羊打到方塊字？」一文，提倡寫別字，詞類運書，准備拉丁化。那是更進一步了。

別字的界說並不容易定；說是以約定俗成爲標準，就

了好些在眼前不應該得罪的國家，徒然爲日本這些國際的同情，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外交上最大的失策。現在蘇聯早已經放棄世界的目標，放棄革命時代的外交口號，而採取睦鄰的外交原則了，然而我們的中國似乎還脫不了那個他所傳授的外交口號，想起來真是慚愧得很。所以我的意思我們今日必須認清國際的局面，採取一種比較和睦的外交態度，替我們多造些國際的同情，國際的友誼，這於我們也是不無少補的。

佩弦

是以通用爲標準，固然不錯，可是通用的標準也很難嚴格說明。譬如「無」字固然通用，「无」字也不僻；「考」字固然通用，「攷」字也不僻。我們可以說「攷」字用得少些；但「无」字情形就不同，普通讀書人多用「無」字，而俗刻書裏却多用「无」字。從前說「約定俗成」，大概只以普通讀書人爲限，俗刻書是不算的。按這個標準，「无」「攷」兩字算是「古字」，而非通用字。——「古字」的名字有語病，實在就是「現在罕用字」的意思。所以舊時寫別字固然爲人所笑，爲功令所斥，寫「古字」也

算是好奇之過，不討好。至於讀別字，說來也夠複雜的。書音和語音不同，如「車水馬龍」與「來輛車」的兩個「車」字；方音有時不同，如「草振」的「草」，北平人讀「該」，湘西人讀「琴」；字調（四聲）的變化無方，更不用說了。但向來說讀別字，只按普通讀書人的書音為標準，那却簡單得多。還有本來是別字或別音，因為一般人士都當作正字正音用，似乎有漸漸變成正字正音的樣子，原有的正字正音倒反要成為「古字」「古音」了。如「竭力」現在通寫作「極力」，「滑稽」（骨稽）現在通讀作「華稽」（註一）都是顯例。這算是新的「約定俗成」，我們無須也怕不能深閉固拒。

新教育施行以來，直到近年，寫「古字」的差不多很少了，寫別字讀別字的却增多。這自然因為學習識字寫字的時間減少之故；有人說漢字繁雜也是主因，不然別國文字教育，時間也差不多，怎麼會成功呢？這樣說的人一定忘記了西洋文字教育裏拼法錯誤一個大問題；那其實就是中國的寫別字，他們也是至今還未解決的。讀別字的問題，在西洋也許少些，但如倫敦俗音，不讀h的聲音（如Hire讀為Ire）之類，也頗為受教育的人所詬病。再說漢字雖然繁複，可是據周先庚先生研究，也有它們的完形性，

易於辨識，或為拼音文字所不及。（詳見周先庚先生美人判斷漢字位置之分析，中國測驗學會研究報告之八）周先生的意思，漢字教學方法若改良，學起來也未必特別難。這個意思雖還是個假設，要等逐步實驗才可下斷語，可是說漢字繁雜是別字的主因，却暫難相信了。

關於教學法改良，在前年那文中已說到應注重訓練一層，特別在小學與初中裏。具體的辦法，該等專家去研究；但默寫與字表考試似乎都可施行。字表可分年級制定，與教材連絡，這個自然也得靠專家。數筆順在小學裏也是基本；但像前幾年所見那樣，教小學生們就指書空，似乎不如讓他們用筆寫在練習簿上。——不知這句話外行否？關於寫字，大約也需要心理技術，聽說定縣現在有人正在研究。除了教學法之外，簡體字的施行，也可使漢字更容易寫，即使不更容易識。有人怕簡體字施行以後，一面要識簡體字，一面還要識尋常漢字，如既要識「變字」，又要識「變字」，豈不更難。但主張簡體字的人覺得如定好了一套簡體字，由教育部公布，像公布注音符號一樣，簡體字便很容易通行，不久當能取尋常漢字而代之。雜誌報紙不用說，便是古書，如有必要，也可用簡體字翻印。（也有主張簡體繁體並用的，過渡時期事實上富不免如此

。但不必主張，我們盼望那些繁體將來都變成「古字」。我們得注意，現在「論語」「人間世」已改用簡體字，「太白」等四種雜誌也將採用，更重要的，教育部已請錢玄同先生編製簡體字表，不久就可公布；這個運動已經離開了純粹討論的時期了。簡體字通行，教學法改良，文字教育易於進步，別字必然減少。至於胡愈之先生的提議，我不以為然。一則拼音文字在中國施行的可能性太小，此層多有論者。二則胡先生故意滿紙別字，雖和方塊字開了大頑笑，却讓讀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猜那樣滿紙寫別字，也必定比平常作文多費一兩倍工夫。他的提議大概不會有實際影響。

歐游隨筆

(九)俄德的異同

從斯塔林的俄國到希特那的德國好像從北極到南極。這是我初到柏林的感想，也是一般人的觀察。然而仔細一看，相異之處固多且大，相同之處亦不少，並且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絕不是三言兩句所能總結的。讀者請注意：我所講的是異同，不是優劣。論優劣，這問題更加複雜了。

至於現在人寫別字讀別字，應加寬恕，不必嘲笑，那是不錯的。但該分別而論。在學校裏的學生還該由教師隨時矯正；不過標準可以放寬些，寫的方面，可以准寫簡體字；讀的方面，方音和國音可以准其並用。固然，因為下文關係，寫別字讀別字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妨害，但是不寫別字不讀別字，像穿乾淨衣服一樣，豈不更好。愛好之心，人皆有之，我想沒有人是愛寫別字愛讀別字的，只是不由自主罷了。至於社會一般人，有機會也可給他們矯正，多一半却只能聽其自然。

(註一)滑稽舊說也可讀「華稽」，但向來通讀「骨稽」，近年改讀，原是讀別，不是遵古。

蔣廷黻

。因為政治制度的優劣，除了客觀的成績可以作判斷的標準以外，還有主觀的條件。在俄國，我常聽見共產黨徒這樣說：「縱使我的物質狀況比美國人的差十倍，我還願作蘇聯的國民，不願作北美合眾國的國民。」可是美國人也說：「就是列寧所夢想的天堂臨世，我不願進那個天堂。我還是寧作個老實的美國人，享受一個平常的美國人

所能享受的權利。」所以政制的優劣絕非僅憑客觀的成績所能定的。

何況這客觀的成績是不容易測量的。

俄德兩國相同最大之點是兩國皆一黨專政。兩國皆絕對否認自由主義及國會政制。否認之理由雖不同，否認之澈底是完全一樣的。共產黨與國社黨均不容黨外有黨；這是我們都知道的。這一點，兩黨現在完全作到了。現在牠們所怕的不是黨外的黨，是黨內的派。兩黨對付「正道」的派別均用極高壓的手段。德國六月三十日的案件就是派別的爭執；結果，據政府發表的統計，反補系的人士被殺者七十餘人，據謠傳則遠過此數。最近因啓洛夫（Kriow）在列寧格那被刺，斯塔林認此案是金羅維業夫（Zinoviev）派的反動的表現，於是這「反動派」的人員未經法庭審判而被處死刑者已過百人。一星期前，英國勞工黨選向倫敦蘇聯使館提出所謂「人道的抗議」。今天莫斯科的機關報尚說莫斯科的「赤帝」（Red Tsars）的殘暴已超過了歷史上最殘暴的「白帝」。（前不久，我在「國家檔案保管處」（Reichsarchiv）讀了一篇一八六一年年的報告，批評威豐十一年兩太后令肅慎自盡，說那是亞洲人的野蠻（Asiatic barbarity）。看來我們的「野蠻」比歐洲人的「文明

「還文明多了。」）在兩國，黨的「正道」均是領袖定的。俄國人怎樣崇拜斯塔林，我已經報告過。德國人的崇拜希特那完全相同。在兩國，黨的領袖發表的政見就是全黨全國的天經地義，其權威遠在我們「專制」時代的「聖旨」之上。看了這兩國的情形之後，我以為我們舊日的政治不應該稱「專制」。

兩國在制度上雖同是一黨專政，實際上人民的自由程度很有差別。在俄國，除黨報官報以外，絕無別的報。這裏黨報雖不少，民報仍佔多數，不過都受檢查。德國現在正排斥猶太人，但是猶太人仍繼續公開的辦報，來與國社黨的機關報辯論。在莫斯科，我買的外國報紙僅巴黎人類報——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這裏賣報的小攤兼賣外國的報紙，共產主義的除外。我每天除德國報外，要買一份倫敦泰晤士報及巴黎時報。這兩個報對國社黨絕無好感，但自我到德國以來，這兩個報對德國政府扣留了一天。俄國有個很嚴密的，操人民生死權的秘探部；這裏似乎沒有，或有面不及俄國的那樣利害。俄國的革命是大流血的，大恐怖的革命。事情雖在十餘年以前，至今俄國人還沒有脫離恐怖的心理和空氣。其主要原故之一就是這個秘探部的存在。國社黨的革命可以說是個未流血的革命；他得政

權的經過始終維持法統，至少在手續上牠可說牠受權於民。所以在德國無須用恐怖來維持政權。

俄德兩國相異最大之點是在專制的目標。俄國共產黨的專政是為勞動階級專政；目的是要建設無階級的社會。共產黨員讀歷史只看見階級壓迫；別的都是這個壓迫的附產。所謂國家，民族就是這種附產之一。在蘇聯之內，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民族的自大是黨的紀律與道德所不容的。國社黨的理論正與共產黨的針鋒相對。在德國，階級的奮鬥就是大逆不道，民族平等的學說是猶太人的玩意兒。國社黨人讀歷史只看見亞理安人 (Aryan)，尤其是亞理安人之中的德意志人的創造；他們以為世界的劣族專與德意志優秀民族為難。優秀的象徵是勇敢，義氣，人格的尊崇，及創造的能力。德意志人的職責就是團結起來為民族奮鬥。

德國為什麼現在大講族國主義呢？國社黨的背景是什麼？我們倘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了解現在的德國。因為希特那的運動也是應時而生的，是有根源的。在理論上，這種主義並不是新的。歐戰以前，西洋各國都有這種趨勢，不過在德國最發達。那時候，張伯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及尼采 (Nietzsche) 的學說已風行德國。

(現在這兩人的著作在德國的銷路很好。國社黨的理論家 Alfred Rosenberg 極端推崇他們兩人。) 所以在歐戰的時候，協約國的宣傳，尤其是威爾遜的宣傳，就把這種主義作為德國的罪名。英美法各國均說：他們所要打倒的不是德意志人民，是普魯斯主義，軍國主義；如德國人能自動的放棄這種主義，打倒這主義的代表人物及制度，協約國願與德國訂平等的條約，共立國際聯盟，以圖建設一個更光明的世界。一九一九年的威爾遜憲法 (Wilsonian Constitution) 果然把普魯斯主義掃蕩了，把世界上最進步的平等自由的學說都擱進去了。維爾塞條約是否因此而減輕條件呢？一點也沒有。德國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我到柏林以後不久，看見國社黨不近人情的提倡族國主義，就發生疑問。所以我遇見德國知識階級的人就談這個問題。最好的答覆是個柏林大學的學生給我的。他說：我是個窮苦學生。對於貧富的不均我何嘗不氣呢？不過我們國內若有階級革命，國力必因此減少，外人必乘機更加欺壓我們。不差，那時他們不會指着我們的什麼軍國主義，或普魯斯主義；他們會指着我們的共產主義，更覺得師出有名了。法國就會把萊茵河左岸全佔了。佔了以後，法國還要說她是為西方文化奮鬥

。那時我們靠什麼？靠誰？靠民氣嗎？靠革命的精神嗎？我們知道現在的戰爭不比百年以前的拿破侖戰爭。現在任何氣或精神抵不住飛機大炮。靠世界的無產階級來營救我們嗎？自從我們戰爭失敗以後，近十五年所受的痛苦也就夠了。我們沒有看見英國或法國的勞工設法制裁他們的政府。德國政府割土地，德國的勞工就須多出力，少賺錢，德國政府還賠款，德國的勞工，連同德國其他階級，就須少吃些，少喝些。我們儘管說我們工人只知有階級，不知有國家，這個世界不容我們不與國家同休戚。除了培養國力以外，我們是沒有出路的。

這是國社黨的族國主義所以受歡迎的根本理由。

共產黨只知有階級，國社黨只知有族國；這不是北極與南極之相對嗎？然而仔細考察一下，異中有相同的。在德國方面，國社黨有牠的社會政策；在俄國方面，共產黨實際亦不忘國家。結果兩面相差並不如表面上看的那末遠。我可以稍微加以解釋。

國社黨的原名是：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族國社會主義的德意志勞工黨」。這個名詞包括社會主義及勞工。希特那常說：如族國不要勞工

有階級覺悟，族國必須消滅階級。國社黨革命以前，共產主義能在德國得一部份的勢力，希特那以為其過應由資產階級與猶太人共負。國社黨的大使命固在提高德意志人的族國自覺，但其主要方法是在使勞工愛國。自畢士麥以來，德國歷代政府所立的勞工保障法，國社黨當然保存。此外對於失業工人的救濟，國社黨不遺餘力。政府以政府的財力大興土木。荒地能墾殖的竭力移城市失業工人去墾殖。物價由政府平衡，平民必須品定價低，富民用品則定價高。到了冬天，政府負冬賑的責任，舉行各種捐款。最有趣味的是工役服務（Arbeitsdienst）。各階級的青年必須替國家作六個月的苦工。這個運動的作用甚多：其中之一就是要非勞工界的青年能了解及欣賞勞工的人生觀。此外還有所謂「由樂而強」（Kraft durch Freude）的運動。黨部替勞工造種種娛樂的機會，如演戲，奏樂，組織球類比賽，旅行。國社黨最重國內的旅行。牠的理由是：知祖國而後能愛祖國。

俄國的政治理論雖專重勞工利益，一般俄國人的生活遠不及一般德國人的。其理由與主義或制度沒有多大的關係。俄國人民，在西歐人的眼光裏，是個落伍的民族。你如果拿俄國人來比德國人，德國人必認為是侮慢他們。這。

不是說，俄國沒有大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工程師，文人，美術家，可以與西歐的大人物相比的。俄國的上級社會早已西歐化，達到西歐的水平線；他們對於西洋文化也有不少的貢獻。這是西歐所承認的，也是俄國在近代史上所以能成大強之一的主要原故。我這裏所講的是一般人民的知識，道德，技術的水平線，各種事業的中級及下級人員。在這方面，俄德相差很遠。這是俄國建設的大困難。添聘外國工程師，收買外國的機器，而以政治專制的力量及國家經濟的計劃來推動，固能使俄國在三五年內建設一定數目的工廠，發電廠，集耕莊等。但是機器有了，駕駛機器的人，在數與質的兩方面都不夠，結果不外效率低，機器毀壞的多，材料浪費的多。並且共產主義的實行須要最高的責任心及公德。俄國工人應該每天作七小時的工作，這算優待了，但是實際他們只作五到六小時。這些困難，德國都沒有。德國人的知識和技術水平線之高恐怕是全

世界之第一。他們的責任心及紀律之好尤其令人佩服。德國在戰後各種艱難之中能維持較高的生活，主要原故就在這裏。

同時俄國人雖講大同，蘇聯政府之提倡愛國並不在他國政府之下。不差，共產黨所提倡的是愛社會主義的祖國，國社黨所提倡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國家，但是實際上我看不出什麼分別來。蘇聯努力軍備亦不在他國之下。蘇聯的外交，與別國一樣，全以蘇聯的利益為前提。用的方法是遠交近攻。蘇聯想避免戰爭；依我看來，德國也想避免戰爭。德國現在在軍備上及外交上均不能作戰。為德國計，維持和平是上策。至於一般德國人之渴望和平更不用說了。使人心不安的是國社黨的理論認戰爭是人類進步的工具。這是德國人的傻氣，也是德國人的老實。

十二月二十七日書於柏林

編輯後記

編輯者

△我們這一期有兩篇討論教育的文章。顧毓琇先生提出一種辦法，使大學教育與救國大計發生一種更密切的關

係，很值得教育當局及大學校長的注意。陳銜哲女士最近寫成一篇居理夫婦合傳譯本的序言，承她先送給獨立發表

，我們甚為感激。在這篇文章中，她對於現在的教育制度，有一個很重要的批評。

△這一期又有兩篇討論外交問題的文章。我們讀了上期微塵先生的「如此外交」，再來讀張忠絨先生的「弱國是否無外交」一文，對於中國今日的外交局面，有幾個人是不着急的？吳其玉先生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在「中東路出售以後」的文章裏，有一個具體的提議，希望讀者加以思索與討論。

△朱佩絃先生，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任主，他在「論別字」中提到的另一篇文章，曾在獨立第六十五期發表。

△蔣廷黻先生的俄國遊記，已曾告一段落。在這一期的隨筆裏，他說從俄國到德國，好像從北極到南極。他在全篇中，發表他比較的觀察，非常有味。

△我們很高興的報告，胡適之先生的健康已經完全復原了。下期的獨立，他一定有文章與讀者相見。

本前 要 三 號 目

第一二六號	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	陳之邁	興趣與職業	吳景超	如此外交	微塵
	民主與獨裁的討論	陶希聖	都市與農村	衡哲	公醫與醫學教育	陳志潛
	大學研究院與學術獨立	姚徵元	不復與農村中國也可以工業化嗎？	周先庚	歐游隨筆(八)出蘇俄境	蔣廷黻
	再論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	叔永	我們可走第三條路	陶希聖	讀蘇俄境	張培剛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吳景超	再論民主與獨裁	姚溥蓀	讀經與新文化運動	李子超
	編輯後記	編者	編輯後記	鄭林莊	編輯後記	編者
				丁文江		
第一二七號	薩爾歸還德國	吳景超	如此外交	衡哲	公醫與醫學教育	微塵
	新中國女子的五年計畫	周先庚	歐游隨筆(八)出蘇俄境	陶希聖	讀蘇俄境	張培剛
	興趣與職業	陶希聖	都市與農村	姚徵元	不復與農村中國也可以工業化嗎？	叔永
	我們可走第三條路	叔永	我們可走第三條路	吳景超	再論民主與獨裁	編者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吳景超	再論民主與獨裁	編者	編輯後記	
	編輯後記	編者	編輯後記			
第一二八號						

獨立評論合訂本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每冊價目：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